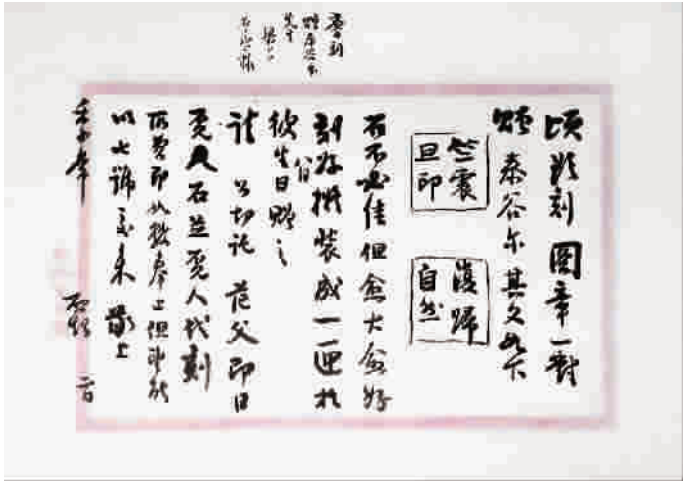


竺指“天竺”，是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震旦”又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而让两大文明古国联成一位印度诗圣的中文名“竺震旦”之梁任公文献，尘封近百年后，如今又现身寒斋：“顷欲刻图章一对赠泰戈尔，其文如下：‘竺震旦印、复归自然’石不必佳，但愈大愈好，刻好拟装成一匣，于彼生日（八日）赠之。（旁刻赠泰戈尔先生，梁○○等字样）请公切托茫父即日觅石并觅人代刻，所费即如数奉上，但望能以七号交来。敬上。季常。启超，二日。”季常是蒋念益，松坡图书馆总务部主持，茫父即书画家姚茫父，笺为“饮冰室用笺”。有关这段世界文坛佳话，又要追溯到一九二四年的四月十二日。

这天是农历初九，一弯新月刚下天穹，徐志摩便早早出了门赶去虹口的汇山码头。江畔的寒风吹冷了志摩秀颀的脸，但他此刻的心还是暖意融融，不时踮起脚尖注视着黄浦江上缓缓驶近的“热田丸号”邮轮，忽然志摩兴奋地指着二层甲板说：“看！那个戴红帽的白胡子老人不就是泰戈尔吗？”岸上欢迎的人群开始躁动起来，“在哪里？在哪里？”等船靠上码头，人们这才看清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

◆ 王金声



了泰戈尔身披棕色长袍伫立船栏边凝望着岸上这座华美的城市，见欢迎者脱帽行礼，他也微微欠身俯首、合十为礼，这位全球闻名的印度“诗圣”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乘坐“热

田丸号”当天抵沪，开启了他的首次中国之旅。

徐志摩与郑振铎、张君勱等随欢迎人群涌上甲板为泰翁戴上花环，坐上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藤椅摄

影留念，面对记者他情不自禁地说道：“朋友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这番话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他们簇拥着泰戈尔一行下了船，乘车前往下榻的沧州别墅。

泰戈尔来了，上海首先向这位伟大的印度诗人敞开友好的胸怀，徐志摩以接待员及随行翻译的身份不离泰翁左右，一同赴龙华赏桃花、悠游“爱丽园”，又偕诗人去杭州西湖泛舟。泰翁在沪逗留期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多次作了公开演讲，他的到来无疑是中国文化界的盛事，也是近代中国在西方思潮不断涌入的同时，聆听到了一位东方智者的声音，受到大批崇拜者的热烈欢迎。然而作为诗人的泰戈尔并没谈诗，而是为上海引入西方物质文明后看不到丝毫东方文明的危机担忧，固然引来了知识界两派对立的纷争，有人在演讲会场里散发反对他的传

单，这也让他感到迷惘和失落。

结束了上海之行，泰翁一路北上，相继访问了南京、济南、天津于4月23日抵达北京。在京期间泰翁应邀又作了数次演讲，耐人寻味的是欢迎者的掌声与反对者的批评声同样热烈，他的一言一行不知不觉已被推入“东西文化之争”的漩涡中，但他阐述的爱、宽容与和平的理想也在人们心中引发深邃的回响。5月8日适逢泰翁64岁生日，北京的学界朋友胡适等人在协和大礼堂为他举办了庆生宴，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先生也赶来祝寿：“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过他64岁的生日，我们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并将两方印章作为贺礼亲赠老人。

泰翁十分珍视“竺震旦”这个名字，每每提及都会动容，诗人用自己的一生，履行着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承诺。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我心里早已明白：我在哪儿找到朋友，便在哪儿获得新生，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

今年是德国杰出音乐家、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被称为“乐圣”和“交响乐之王”的贝多芬逝世190周年。我有幸请我国著名雕塑家和音乐家唐锐鹤教授设计并亲手镌刻了一把乐圣纪念壶。此壶高7cm，宽13cm，壶型为柱础。壶体由青年壶艺师孙宏地精心制作，泥料为宜兴的降坡泥。

唐教授在壶体正面精心创作并绘刻了贝多芬的头像。头像上，贝多芬目光坚毅，卷发冲冠，嘴唇紧闭，手持一只老式助听器，正在创作其最著名的交响曲——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此像刻画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头像下方刻画的一组五线谱，正好是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开头出现的强有力的富有动力性的四个音。贝多芬在总谱此处写下一句动人心魄的警句：“命运在敲门”。壶体的另一边则刻着中国《易经》中的经典之词“天行健”，同时，在其下方一行漂亮的花体英文“Heaven mov-

乐圣纪念壶

◆ 蔡一宁



ing vigorously, man striving ceaselessly.”(意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之相互映照。此正应着命运多舛而不屈服于宿命的贝多芬那自强不息的可贵精神。落款分别为“唐”和“Ruihe”。此壶中西合璧，文

化信息和内涵颇丰，是一把题材独特的纪念壶。

贝多芬(1770年12月—1827年3月)是个音乐天才。凭着对生活的狂热之爱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以极其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形式充分展现内心的丰富思想和炙热情感，并表达出属于全人类的坚强意志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他承前启后，不仅是古典主义风格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浪漫主义风格的开创者。他创作的9首交响曲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价值。其中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更是脍炙人口，成就非凡，是他留给全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命运》是一首英雄意志战胜宿命论、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贝多芬开始构思并动笔创作c小调第五交响曲是在1804年，完成于1808年。其间他的耳疾不断恶化，听觉日渐衰弱，已完全失去了治愈的希望。但他不屈服于命运的挑战，战胜了失聪病痛的折磨和心理情感的绝望，创作出了这部被恩格斯盛赞最杰出的音乐作品。

奥地利诗人格利尔·巴采在贝多芬的墓碑上题词：“当你站在他的灵柩眼前的时候，笼罩着你的并不是志颓气丧，而是一种崇高的感情；我们只有对他这样一个人才可以说：他完成了伟大的事业……”

九元五角买《辞海》◆ 郑自华

报载，第七版《辞海》编纂出版工作也已经在2015年正式启动，并将于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之际出版。

我还记得，在孩提时，我就对字典充满了敬意，那年，我在读小学，一次有事到办公室找老师，看见老师正在翻一本厚厚的书，老师说：“这是我的不说话的老师。”小学时代学生对老师都敬慕得很，而老师称这本厚厚的书为老师，可见这本书不简单，于是我知道了这本厚厚的书就是字典。进了中学我才知道，《辞海》比字典更详尽、更丰富、更全面。如果把字典比作老师，那《辞海》就是教授了。1979年，《辞海》正式出版了，为了便于收藏和阅读，出版社专门出版了缩印本，价格22.20元。这笔金额对今天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稍微过得去的烟只能买1包，可当时的22.20元要占我一个月收入的近一半，而且那个时候的



我正在装修新房准备结婚，钞票相当紧张。我打听到印刷厂内部正处理一批《辞海》，无非是在《辞海》的扉页上盖了“印刷质量不符规格，售价玖元伍角”字样。恰好耀庭兄在这家厂工会工作，当我赶到厂里，谁知只剩下一本了，有好几个人都争着要，都在讲自己需要《辞海》

的理由，我灵机一动，赶紧拿出那张崭新的、大红的《结婚证》：“我的结婚新房需要书香味。”那年头商品奇缺，许多东西都得凭票供应，我只能将《结婚证》随身带，真没想到这回派了大用场，耀庭兄顺水推舟，于是我拥有了心仪已久的《辞海》缩印本。我将它放在新房的最醒目处，同事、朋友来玩时，首先看到的的就是《辞海》，再一看价格，都羡慕得不行，于是我得洋洋将9.50元买《辞海》的故事说了一遍。《辞海》是我所有藏书中单本最厚、块头最大的一本书，也是使用价值最高的书。

平斋黄教奇兄旅居日本静冈市近三十年，执教传统书法篆刻，传授中华文化，成就卓著，已恭列日本篆刻家协会常务理事之座。2013年，日本久能山东照宫博物馆为纪念日英通商400周年举办纪念特展，请黄教奇篆刻了一方1613年江户幕府时代盖在日本通商“许可状”上的巨印——“源家康忠恕”朱文印，展出后由东照宫博物馆永久收藏。教奇兄回沪时送了我这张印拓，印面8.5x8.8cm。整方印刀法醇厚古朴，石花斑驳自然，甚有旧气。此事可与徐庆华兄去年为上海交大重刻“交通大学印”，合成一段印坛瑜亮佳话。

这方印原物已经流失了，印样是从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所藏的“许可状”上复印来的。教奇兄花了一周时间精心刻制，其认真的作风可以想见，为了求证这方印的正确释文，他专门请教了日本篆刻界的

权威真锅井蛙与河野隆两位先生。我认识教奇兄也有20年时间了，那是在我们韩门一位日本篆刻家师兄出口芳治来沪办展的开幕式上，教奇兄的主持风格端庄、儒雅，声音浑厚、纯正，我以为是请来了哪位电台播音员，所以印象很深刻。教奇兄的父母家离我家只相隔一条半马路，所以他每次回沪，我们俩总要一起喝个茶谈谈艺，受益良多。

我对此印的释文总有些好奇之心。这方印在日本现在通常公认释读为“源家康忠恕”。源家康就是德川家康，他是建立江户幕府的一位伟大将军，因开创江户幕府265年强盛、和谐时代而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和崇拜。印是用古汉字篆写，从

平斋摹刻源家康巨印

◆ 李志坚



排列看应是两列六字。看字的结构，作者可能是略通汉字的日本人，在古汉字基础上尽情发挥了抒情的想象，笔画变得脱离了汉字的书写规律。左上一字三笔，可以作“水”、

“永”等字猜想，左下的“恕”字“心”部也分拆得离谱，但总体上还能看出明代汉字印的风貌，在稍后时期的周亮工《赖古堂印谱》中尚能找出近似风格的印例。

如将此印两列顶上两字合读为“源”，一字横骑两列，这种构印法在古代中国从无先例，且从本印的结构看，此字怎么也不像是“一个字”，左右情意相背，高低分离相乖，作者当初设计时，难道没有想到会被后人识读为“水”、“原”两个字，自找麻烦吗？

德川家康原姓松平，后奉敕改姓德川，松平源自藤原氏，自称源自源氏，是有着复杂的因缘的。有关松平家康的改姓，是一个日本战国史

研究领域的专题，此印或许是研究中的一个颇有故事性的重要史料也未可知。后人将此印释读为“源家康忠恕”，有其不那么简单的原因。在《中日文化交流史》资料中可以找到，德川家康江户幕府时期曾有“源家康弘忠恕”朱印用在外交文书上的记录，当时建立了“朱印船”制度，即出贸易的船只必须获得幕府批准，得到幕府发给的朱印证书。当时的角仓了以出航安南国的两年前，德川幕府已致函安南瑞国公阮潢，“本邦之舟异日到达贵地，以此书印，可以认证；无印之舟，不可许之。”如果这方朱印就是教奇兄所摹的此印，则左上一字曾被释读作“弘”字，但从字形看显然很牵强，右半字拆为分离的两笔，这种美化实在没有依据。究竟如何释文？又如何理解这种日本印现象？期待研究者进一步探索。